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08

“理性主权”与金融资本的“僭越”：西方“民主危机”的深层逻辑

王坤[1]，廖名岩[2]

（1.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逆全球化浪潮与美国两党极化博弈的交织，为剖析当代西方民主危机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视角。以“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左右派之争”为切入点，聚焦两党博弈与金融资本“僭位”的互动关系，构建“理性主权－金融资本－两党之争”的分析框架，可发现代议制民主所标榜的“理性主权”，在金融资本的持续侵蚀下逐渐空心化。美国左右派之争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金融资本霸权下利益分配矛盾的集中爆发。金融资本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文化霸权塑造等手段实现对两党政治的“双重操控”，使两党在移民政策、产业回流、金融监管等核心议题上的博弈陷入身份政治内耗，最终沦为资本逻辑的工具。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进一步利用两党分歧强化自身垄断利益，导致西方民主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代表性的矛盾愈发尖锐。西方民主危机的本质，是金融资本逻辑凌驾于民主逻辑之上的系统性失灵。

关键词：理性主权；金融资本；两党之争；逆全球化；民主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069-07

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1]。但在当下，金融资本僭越理性主权、塑造两党之争，导致西方代议制民主深陷困境，政治极化、利益博弈失衡等问题凸显。基于此，本文构建“理性主权－金融资本－两党之争”三角互动分析框架，以逆全球化为动态驱动变量，分析当今西方“民主危机”，以期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代议制的演进与“理性主权”的异化

近代代议制以理性为核心构建主权理论，曾被视作规范权力、保障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但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西方代议制逐步暴露结构性缺陷，理性主权不断异化、空心化，催生诸多民主乱象。为厘清西方民主危机的内在逻辑，本部分从代议制演进脉络出发，界定理性主权核心内涵，剖析其空心化判定标准，拆解理性主权、金融资本与两党之争的三角互动关系，深挖西方民主失灵的深层机理。

（一）代议制的演进与“理性主权”的确立

古希腊城邦时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人王”统治图景，将“理性”与“美德”作为合法统治核心，反对财富、野心驱动的寡头与僭主政体[2]，这种以知识与美德为精英选拔标准的原始精英主义，成为“理性政治”起源，但与后世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理性主权”有本质区别。中世纪晚期，欧洲封建割据、

收稿日期：2026-02-10

作者简介：王坤，男，湖南茶陵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神权垄断的格局无法满足新兴资产阶级需求，近代代议制应运而生：英国“平民议会”演变为下议院，法国大革命前“三级议会”赋予商贸团体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基佐认为，代议制是欧洲政治发展的“完全自然的和必要的”选择[3]12，为“理性主权”奠定了制度基础。

代议制的演进与资产阶级崛起深度绑定，自诞生起就是其维护利益的政治工具。与古希腊精英政治不同，近代代议制“精英”选拔转向财产与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选举权长期被有产者垄断，无产阶级与农民被排除在外，决定了“理性主权”的资产阶级本质。卡尔·施密特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法治国组件的核心是保障资产阶级自由，而非实现民主[4]；埃德蒙·伯克阐释议员“实质代表”本质，认为议员应凭“理性”决策，普通民众缺乏政治理性，其理论塑造了“天然贵族”形象，强化了代议制精英性；基佐将代议制定位为多数人暴政的反面，否定数量优势的人民主权[3]65。综上，“理性主权”本质是资产阶级将自身利益包装为“公共理性”，为主权“空心化”埋下伏笔。

（二）“理性主权”的内涵、特征及空心化判定

本文所指“理性主权”，是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标榜的核心原则，其以“理性”为合法性来源，通过精英议员行使主权，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核心特征有三：一是精英性，主张主权由精英掌握，否定民众直接参与，如伯克的“天然贵族”理念[5]；二是抽象性，将主权转化为“理性”抽象概念，形成勒弗所说的“主权空位”[6]；三是阶级性，“理性”本质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施密特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4]。

结合美国实践，“理性主权”空心化可从三维判定：形式上，议会“理性协商”功能弱化，沦为利益集团博弈工具，如美国国会制定金融监管法案时被华尔街游说裹挟；实质上，主权行使脱离民众诉求，优先保障金融资本利益，特朗普减税、拜登产业补贴均体现这一点；制度上，权力制衡失灵，“旋转门”制度使金融资本与政府权力无缝衔接[7]。勒弗认为，代议制的抽象化导致主权“空位”[6]，为金融资本僭越提供了空间，使其成为西方“实质主权”。从经济大萧条到新自由主义兴起，“理性主权”空心化持续加速，逆全球化则为金融资本僭位提供新契机，三者互动构成西方民主危机的核心逻辑。

（三）“理性主权 – 金融资本 – 两党之争”的三角互动

“理性主权”先天性地具有精英性、抽象性以及阶级性等缺陷，而金融资本的兴起与不断渗透是使其走向空心化的直接原因。金融资本借助游说以及政治献金这类机制来左右政府决策，致使议会成为它的“代言人”，使得“理性主权”失去核心功能，勒弗提出的“主权空位”理论对这一过程有精准的描绘[6]，而金融资本填补主权空位进而成为“实质主权”，是民主危机的根源所在。金融资本利用“双重操控”，将两党政策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使得两党之间的分歧转化为身份政治中的内耗，民众面对的“伪选择”令政治疏离感更为严重，进而加剧了民主合法性危机，两党之间的争斗也成为金融资本逾越主权的关键载体。

逆全球化是金融资本调整盈利模式并运用操控策略所产生的结果。其作为一种动态驱动变量，使资本对两党的操控得以强化，令主权空心化程度加深，促使两党极化状况加剧，进而使这三者形成恶性循环：资本的越界行为致使主权出现空心化，主权空心化又催生出两党极化现象，而两党极化反过来又为资本越界提供机会，最终使西方民主沦为资本的工具，失去革新的能力。

葛兰西提出，统治阶级会借助对文化、意识形态等许多领域的把控以构建社会共识，进而达成所谓的“文化霸权”的状态[8]。这一理论被用于解析金融资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情况：金融资本掌控媒体、智库这类载体，将左右派理念伪装成所谓“普世价值”，以此遮蔽剥削本质，且将两党争斗描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对决，从而为资本僭越行为提供相应支撑。

施密特指出，政治的关键在于“敌友划分”[9]，统治阶层会通过营造“敌人”的途径来实现共识的凝聚。此理论被用来解析两党身份政治走向极端化的情形：在金融资本的左右下，两党把目光聚焦于文化身份的对立之上，共和党把非法移民等当作“敌人”，民主党则将保守派等看作“敌人”，以此掩盖阶级矛盾，

转移民众对资本垄断等关键问题的关注，进而为资本的增殖服务。

二、金融资本对两党政治的系统性操控机制：“资本输入－权力渗透－意识形态塑造－制度固化”

现有研究对金融资本操控政治的分析，多停留在单一手段的描述层面，而本文将重构金融资本操控机制的分析框架，按照“资本输入－权力渗透－意识形态塑造－制度固化”的逻辑，梳理各操控手段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金融资本操控与两党身份政治化的实践路径

1. 金融资本对两党政策的操控逻辑

金融资本借助媒体、智库等平台，不断传播“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的文化理念，将其塑造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路径，这种文化叙事逐渐形成霸权地位，使两党无论处于执政还是在野地位，都不得不顺应这一理念制定相关政策——执政党通过放松金融监管、减税降费等政策回馈金融资本，在野党则通过承诺“更优的金融环境”争取资本支持，本质上都是金融资本文化霸权主导下的政策妥协。两党以“政策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标签划分敌友，执政党将在野党的反对意见定义为“阻碍经济发展”，在野党则将执政党的政策指责为“偏袒资本”，但这种对立仅停留在表面话术，双方在维护金融资本核心利益、践行金融自由化理念上并无本质分歧，敌友划分成为掩盖资本操控本质的政治手段。

2. 两党身份政治化的具体表现与资本关联

两党身份政治化的核心特征是围绕意识形态、社会议题形成对立身份叙事，而这一叙事的背后，始终有金融资本的推动。金融资本通过精准绑定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推动两党形成差异化的身份标签：一方以“保守主义”为旗帜，绑定传统产业资本、中上层群体，强调“市场自主”“减少福利”，将支持福利扩张、加强监管的群体定义为“敌对方”；另一方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绑定新兴产业资本、中下层群体，强调“社会公平”“适度监管”，将反对福利扩张、主张自由市场的群体定义为“敌对方”。这种身份划分并非自然形成的社会分歧，而是金融资本为维护自身利益，人为建构的政治对立。通过这种对立，金融资本可分化社会力量，避免公众形成针对资本操控的统一反抗，同时可根据两党执政情况，灵活调整利益绑定对象，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政治更迭影响。

（二）资本输入：政治献金——操控的基础前提

资本输入是金融资本操控美国两党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手段是政治献金，美国选举献金制度的漏洞为金融资本的“合法渗透”提供了制度空间，二者共同构成了“制度漏洞－运作机制－现实操控”的完整作用逻辑链。

制度基础：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对政治献金的监管存在多重漏洞。首先是“超级 PAC”可接受无额度限制的捐款，直接为金融资本“两边下注”提供了合法渠道；其次是献金披露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匿名献金、间接献金始终处于监管空白地带；同时监管方对“独立支出”的限制较为宽松，金融资本可通过资助独立组织开展竞选宣传，规避直接献金的额度限制。

运作机制：一方面，金融资本主要通过“分仓献金、精准绑定”的机制实现对两党的双重操控。其旗下企业、行业协会、超级 PAC 等多个渠道会同时向两党候选人、竞选团队、政党委员会提供献金，确保无论哪一党派执政，政策导向都会优先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针对两党核心议员、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等关键机构，金融资本会进一步加大献金力度，通过深度利益绑定直接影响核心政策的制定过程。

现实现象：2024 年美国大选期间，金融行业的政治献金总额突破 20 亿美元，其中 60% 流向民主党，

40% 流向共和党，是金融资本“双重绑定”操控策略的直接体现。献金对应的政策回报十分清晰：特朗普政府时期推行的减税、放松金融监管政策，拜登政府出台的产业补贴、温和监管措施，本质上都是金融资本献金后的利益交换，最终形成“献金 – 执政 – 政策倾斜 – 资本增殖”的闭环。

（三）权力渗透：游说机制与“旋转门”——资本与权力的无缝衔接

权力的渗透是金融资本将经济层面的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流程，其核心手段为游说机制和“旋转门”制度，此二者借助美国的政治制度架构实现资本与权力的无间隙对接，这是金融资本操控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

制度基础：游说行业的注册制漏洞与“旋转门”的合法性设计，为权力渗透提供保障。美国游说行业的注册门槛低、监管宽松，部分“政策咨询”“学术交流”等隐性游说无需注册，成为资本渗透的灰色渠道；而“旋转门”制度则具有明确的合法性，美国法律未禁止政府官员与金融机构高管的身份转换，使得资本与权力的衔接成为常态。

运作机制：游说机制负责“政策输入”，“旋转门”机制负责“权力落地”，二者形成联动。金融资本每年投入超过 30 亿美元的游说支出，组建专业游说团队对接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通过提供“政策建议”“数据支撑”等方式，引导政策制定向自身倾斜；而“旋转门”则实现游说者与决策者的身份转换，金融机构高管进入政府任职，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政府官员离职后进入金融机构获得高额薪酬，形成“权力变现”的激励。

现实现象：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曾是高盛集团高管，任职期间推动放松金融监管、减税等政策；拜登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赖恩·迪斯曾在黑石集团任职，推动《通胀削减法案》向新能源、科技企业倾斜，而这些企业均与黑石集团深度绑定。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多名议员离职后均进入华尔街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其任职期间制定的政策均明显有利于金融资本利益。

（四）意识形态塑造：文化霸权——操控民众认知的核心手段

意识形态塑造是金融资本实现长期操控的关键，核心手段是依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通过控制媒体、文化、智库等载体，塑造有利于自身的社会共识，掩盖资本操控的本质。

制度基础：美国的媒体、智库市场化运作模式，为金融资本的文化霸权塑造提供了制度空间。美国主流媒体多为私有企业，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控股控制舆论导向；智库多依赖企业资助，金融资本通过资金支持影响其研究方向；教育体系依赖私人捐赠，金融资本通过捐赠影响高校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

运作机制：金融资本通过“舆论引导 + 理论输出”的双重方式，塑造文化霸权。一方面通过控制主流媒体，将两党之争描绘成“意识形态的对决”，放大移民、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议题的矛盾，避而不谈金融资本的垄断、贫富差距扩大等核心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资助智库、学术机构，生产有利于自身的理论，如将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能力差异，将金融监管放松描述为“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现实现象：在对移民问题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存在这样一个现实情况：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产业外迁才是就业机会流失的根源，但他们要刻意放大文化冲突；皮尤研究中心 2023 年开展的调查显示，仅有 20% 的美国民众信任国会，34% 的民众信任总统，民众政治疏离感不断加剧，且身份政治的内耗越发严重，从本质而言这是金融资本意识形态操控所造成的结果。

（五）制度固化：操控机制的常态化与合法化——闭环的最终形成

制度固化是金融资本达成长期且稳定操控的最终环节，其关键在于将资本输入、权力渗透以及意识形态塑造的机制，通过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转化为常态化且合法化的运作模式，从而构建起“操控 – 获利 – 再操控”的闭合循环。

制度基础：金融资本借助游说、政治献金等方式，促使美国国会修改相关法律，进而使选举献金以及游说行业的自由度进一步拓展，从而固化自身的操控空间。例如 2010 年的“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

会案”这一司法判决，将“政治言论自由”赋予企业，允许企业毫无限制地投入资金参与政治宣传，进而为金融资本的操控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法律条件。

运作机制：构建起“资本行使操控权，政策出现倾斜态势，资本实现增殖，再度开展操控行为”这样的运行良好且循环往复的闭合体系。金融资本借助上述三种方式促使两党拟定对自身有益的政策以达成资本的增殖；随后将增殖所得部分资本再度投入到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媒体掌控等活动之中，进而更有力地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把控并扩张自身的垄断态势。

现实现象：金融资本的操控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潜规则，不管是两党开展选举活动、进行政策拟定，还是权力具体运作，均无法摆脱金融资本带来的影响。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遭到忽略，民主制度在实质层面的代表性完全丧失；并且由于意识形态被操纵，即使民众察觉到资本在进行操控，但因存在身份政治方面的内耗以及政治上的疏离感，致使他们无法构建有效的反抗力量，只能无奈地顺从资本把控的政治秩序。

三、两党核心议题博弈：金融资本僭越的具象化表现

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两党在移民、产业回流、福利改革、金融监管等核心议题上展开颇为激烈的博弈。但是很多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主张，实则是由金融资本构建而成的“身份政治陷阱”，其目的在于转移民众注意力，并掩盖资本对民主的侵蚀这一核心矛盾。

（一）移民政策：文化对立背后的资本劳动力诉求

移民政策是两党关注的要点，共和党秉持严格限制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的主张，以此迎合白人蓝领群体的焦虑情绪；民主党持有放宽移民、强调多元包容的理念，意在获取少数族裔的支持。双方政策表面呈现出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对立状况，其本质实则是金融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操控行为，这同时也是施密特敌友划分理论的具体体现：两个政党通过营造移民群体与本土民众之间的“敌友对立”态势，汇聚选民力量，并转移民众对资本的不满情绪[9]。

金融资本对劳动力有双重诉求：既需要廉价普通移民降低用工成本，也需要高技能移民满足科技、金融领域人才需求，两党政策恰好契合这一诉求。共和党“限制普通移民”看似保护本土就业，实则迎合民粹、掩盖产业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源于资本外迁与金融投机，特朗普执政四年仅新增约40万个制造业岗位，远未达成200万的承诺。民主党“放宽高技能移民限制”，则是满足硅谷、华尔街的人才需求，拜登政府移民改革法案重点放宽高技能移民限制，对非法移民合法化语焉不详。两党博弈最终服务于资本劳动力诉求，民众则被文化对立迷惑，陷入身份政治内耗。

（二）产业回流与贸易保护：资本主导的政策表演

产业回流与贸易保护是两党核心经济议题，共和党主张高额关税、退出国际组织迫使制造业回流；民主党主张政府补贴、基建投资吸引企业回归。但无论关税还是补贴，最终受益的都是与金融资本深度绑定的大企业，普通民众未获实质就业机会增长，两党博弈本质是资本主导的“政策表演”。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看似推动产业回流，实则服务于资本本土垄断——对中国等征收关税主要针对制造业，对金融、科技产品网开一面，保护美国资本全球垄断地位。贸易战导致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中小企业成本上升，而华尔街通过投机大宗商品获利颇丰。如2018年贸易战期间，大豆价格暴跌，华尔街投机基金做空获利。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号称重振制造业，核心受益方仍是特斯拉、贝莱德等与资本绑定的企业，补贴多流向这些企业，而企业未大幅增加本土就业，仍专注金融投机，产业回流沦为口号。

（三）福利改革与金融监管：资本利益的“左右手”博弈

福利改革与金融监管是两党意识形态对立的集中体现，共和党主张削减福利、放松监管，民主党主

张扩大福利、加强监管。但在资本操控下，两党政策均为表面文章，实质上是资本利益的“左右手”博弈：共和党为资本降本，民主党为资本转移矛盾，均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

共和党“削减福利”本质是将社会资源让渡给资本、降低企业税负。特朗普政府减税法案不仅降低企业所得税，还削减中低收入群体福利，加剧贫富差距——2017 年法案实施后，最富 1% 人群收入增长 10%，中低收入群体不足 2%，同时因为医保、食品券等福利被削减，数百万低收入家庭失去保障。

民主党“加强金融监管”是温和妥协，未触及资本核心利益，本质是通过“公平”“监管”叙事掩盖剥削、转移不满。奥巴马政府《多德－弗兰克法案》因资本游说被弱化，拜登政府监管主张迟迟未落实，华尔街仍可通过复杂金融衍生品投机而无需承担风险。民主党看似维护中下层利益，实则维护社会稳定，为资本持续增殖提供环境。

四、西方民主危机的本质：资本逻辑凌驾于民主逻辑的系统性失灵

民粹主义兴起是西方民主危机的直观表现，从欧洲极右翼政党到美国特朗普现象，民粹浪潮席卷西方。但民粹主义并非解药，其本质上是理性主权空心化、资本僭越的产物，其强调空洞身份政治，无法脱离资本霸权体系。西方民主危机的本质并非制度细节缺陷，而是资本逻辑凌驾于民主逻辑的系统性失灵，是代议制阶级局限性与资本操控的必然结果。

（一）民粹主义的异化：金融资本僭越的产物

尚塔尔·墨菲指出，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西方政治秩序，将自由主义凌驾于民主之上，更排斥人民主权，这必然催生新民粹主义，但资本操控使其彻底异化：从“反精英、护民生”沦为资本维护统治的工具。民粹政党利用民众政治激情，构建空洞集体认同、塑造象征化领袖，实则利用“人民”形象谋取政治利益。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中下层支持，但执政政策始终围绕资本利益，减税、放松监管、贸易保护均服务于资本本土垄断。民粹主义无法脱离资本霸权，核心是未认清资本操控的本质，仅指向抽象“精英”。马克思的观点揭示异化根源：西方民主秩序忽视人民主权，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与财产合法性。若不批判资本逻辑，民粹运动终将被资产阶级精英窃夺，沦为资本操控工具，这也是其无法破解民主危机的核心原因。

（二）西方民主危机的三层本质

西方民主危机是资本逻辑凌驾于民主逻辑的系统性失灵，贯穿主权行使、政治实践、价值内核三个层面，是代议制与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

主权行使层面：理性主权空心化与资本实质僭越。代议制“理性主权”因精英性、抽象性、阶级性走向空心化，资本填补主权空位成为“实质主权”，议会、政府沦为资本“代言人”，人民主权彻底丧失，这是危机根源。

政治实践层面：可观察到两党之间博弈表演性与民主存在形式化的趋向。两党之间的争斗已经演变为被资本左右的“表演性博弈”，其关键议题的博弈仅仅是为转移矛盾，助力资本增殖；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局限于投票，而选举结果被资本把控，民主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存在，失去其实在内涵。

价值内核层面：资本增殖与民主价值存在根本性相互对立的情形。民主的核心在于人民能够真正掌握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资本的关键在于追求无限度的增殖，此二者在本质上相互对立。当资本演变为“实质主权”，民主价值服从于资本逻辑，民主制度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此乃危机的根本实质所在。

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的本土垄断诉求不断强化，对政治的操控程度更为深入，这使得危机的三层本质越发明显地展现出来，而西方社会无法借助内部改革化解困境，因为任何涉及资本利益的改革都会遭遇激烈反对。要解决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需突破资本逻辑对民主逻辑的凌驾态势[11]。

西方“理性主权”的精英性、抽象性、阶级性为金融资本僭越提供空间，其空心化是民主危机的核心前提；三者形成恶性循环，逆全球化推动互动深化，构成民主危机核心逻辑；逆全球化下，金融资本盈利模式与操控策略转型，两党政策均服务于其本土垄断诉求；金融资本通过系统性机制深度操控两党政治，是民主危机的核心驱动力；两党核心议题博弈是资本塑造的身份政治陷阱，民粹主义异化凸显民主困境；民主危机本质是资本逻辑凌驾于民主逻辑的系统性失灵，是阶级局限性与资本操控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福山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M]. 陈高华，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XI .
[2] 柏拉图 . 理想国 [M]. 郭斌和，张竹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 弗朗索瓦·基佐 .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 [M]. 张清津，袁淑娟，译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 Schmitt C. Constitutional Theory [M].Durham D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235.
[5] 伯克 . 埃德蒙·伯克读本 [M] 陈志瑞，石斌，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44−245.
[6] Lefort C.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8：17−19.
[7] 于昕鹭 . 美国自由主义宪政的片面逻辑及其实践中的危机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8(1)：77−83+127.
[8] 葛兰西 . 狱中札记 [M]. 曹雷雨，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1−202.
[9] Schmitt C.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Expanded ed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10] 姜英华 . 资本逻辑下“逆全球化”的根源与出路 [J]. 理论导刊，2020(1)：95−101.
[11] 宋朝龙 . 西方现代化价值的嬗变及其现代性文明危机 [J]. 人民论坛，2023(10)：29−33.

“R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Usurp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Deep Logic of the Western “Democratic Crisis”

WANG Kun, LIAO Mingyan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The convergence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wave and partisan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s a new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democratic crisis in the West. Tak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in the U.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ti-global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isan rivalry and the usurp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vereignty of reason, financial capital, and partisan confl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reason championed b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has been progressively hollowed out under the eros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partisan conflict in the U.S. is not a mer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ut an eruption of distributional conflicts under the hegemony of financial capital; through means such as political donations, lobbying and cultural hegemony building, financial capital has achieved a “dual manipulation” of partisan politics, miring both parties in identity-political infighting over core issues such as immigration, industrial reflow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eventually reducing them to tools of capital logic.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ti-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apital has further consolidated its monopolistic interests by exploiting partisan divisions, sharpen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ormal legitimacy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veness of Western democracy.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Western democratic crisis is, in essence, a systemic failure where the logic of capital overrides that of democracy.

Keywords：sovereignty of reason; financial capital; partisan conflict; anti-globalization; democratic crisis

责任编辑：陈璐